

艾特·阿德南《西特·玛丽·罗斯》:

# 讲述黎巴嫩内战的“地下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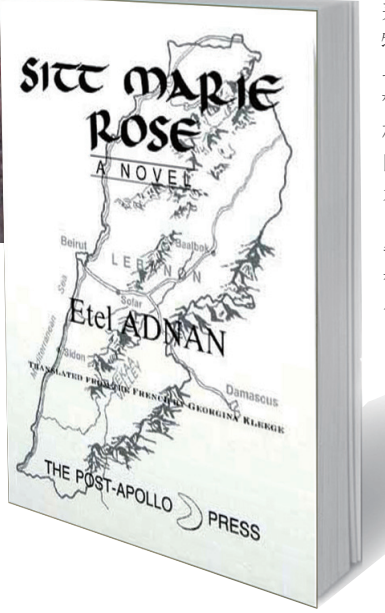
□马 征



艾特·阿德南

戏剧还在美国、法国和德国上映,因此,被誉为阿拉伯现代小说的经典作品。

在《西特·玛丽·罗斯》中,作者运用了多视角叙事的方式,每个叙述者的观察构成一个小节。叙事视角包括参加战争并审判罗斯的多名基督徒军人、加入巴勒斯坦抵抗组织的罗斯、一名来自基督教家庭的女知识分子和聋哑院的一群聋哑儿童。这些叙述视角实际上分别代表了三类人物的观点:参与战争的基督徒和穆斯林、战争中的普通民众。



《西特·玛丽·罗斯》英文版

尼尔·托尼·福德、皮埃尔·他们从小在黎巴嫩受到法国特殊的殖民教育,信奉法国殖民者宣传的基督教价值标准,狂热地投入“宗教战争”。罗斯少年时代的恋人穆尼尔是西方殖民教育的牺牲品,罗斯曾回忆少年时期的穆尼尔和其他黎巴嫩基督徒少年所受的教育:

……穆尼尔的朋友们影响了他,他也同样嘲笑阿拉伯电影和属于那个地区的其他事物。这是因为耶稣会信徒教育他们信奉巴黎的价值取向。……这些男孩儿为十字架感到兴奋,那些法

国神甫每年都要举行一次游行,在游行中,所有基督教教会学校的学生穿上白色的外套,外套从前到后缝着一个方形的红十字,他们头戴系着头绳的手织布,这使他们看起来不像阿拉伯人,而像十字军战士。他们手拿棕榈树枝穿过贝鲁特的大街,唱着“我是一名基督徒,这是我的荣耀,我的希望,我的支柱……”第二天,他们在学校为打败无信仰者而自豪,他们梦想成为一名头戴盔甲、脚穿长靴的基督徒,骑马穿过战场的废墟,就像圣·乔治刺穿无数的龙一样,刺穿穆斯林步兵。这样,生长于黎巴嫩基督教家庭的男孩子,自幼受到法国殖民者的宗教教育,他们自认为是欧洲人,崇拜欧洲的一切,信奉暴力和杀戮。正如审判罗斯的穆尼尔所言:“什么是道德?我只承认国家政体的权力,即使它仅仅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是暴力加速了人们的进步。”

与穆尼尔处于同一战线的其他几名基督徒军人,不像穆尼尔那样思考文化或政治,杀戮对他们而言,更加直接和出自本性,他们嗜好和“沉迷”于猎杀,作品中有一段对福德的描述:福德对猎猪近似沉迷,与亲吻相比,他更喜爱杀戮。他憎恨“做爱”这一表述,因为正如他所说,你们没有做任何东西。与“姑娘-在床上-操”相比,他更偏爱“吉普-高速-沙漠-鸟-子弹”。在暴力文化的教育下,杀戮者统治一切,城市、国家和普通民众不可避免地沦为牺牲品。

在作品的叙述视角中,有一位贯穿始终的女性作家或编剧,她是穆尼尔从小认识的女性朋友,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穆尼尔邀请她合拍一部表现黎巴嫩女性的电影作品。这位女性知识分子的视角,从一开始就是清醒和理智的,她像普通黎巴嫩人一样,经历和体会了战争的痛苦。亲眼目睹了死亡,见证了战争对城市的破坏和摧残。她独立于战争中的任何一方,是中立者、旁观者,无论是对于穆尼尔和他的基督徒朋友们,还是对于玛丽·西特·罗斯,她的叙述更加客观和具有普遍性,隐含着“写作者”的视角。

全书的开始是这位女性知识分子对穆尼尔和几位基督徒朋友的描述。战争开始,猎杀鸟是他们最大的嗜好,战争满足了他们暴力和杀戮的愿望,于是,满目杀戮和死亡的她,希望最好在黎

巴嫩的空中放飞100万只鸟,让这些狩猎者把杀戮的对象从人变成鸟。她看到报纸上每天充斥着死亡的消息,看到整座贝鲁特城遭受巨大磨难,如同被蹂躏和侮辱而导致疯狂的姑娘:

然而,除了这座城市的居民和人们忘记喂养或在弹雨中杀死的动物,谁是真正的迷失者……这座城市就像一个遭受了巨大磨难的存在,太过疯狂、索求过度,现在破碎了、绝望了,她就像那些被30或40个军人蹂躏的姑娘们,被家人送进疯人院,她们疯狂了……这座城市就像那些被强暴的姑娘……

“在这个强权的社会,软弱者被视为魔鬼的造物,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遭受迫害的不仅是贝鲁特城,更是无数作为弱者的普通民众,那些无处遁逃的聋哑学校的聋哑儿童,便是这些无辜牺牲者的典型代表,整部作品以对罗斯的行刑和聋哑人不可避免的死亡结束,战争如同“黑色的节日”,死亡如同这黑色节日中的“舞蹈”,似乎这里在上演着一场“死亡的狂欢”:

无论你喜不喜欢,行刑总是一种庆祝。它是不同表象的舞蹈,在死亡中它们得以稳定。它是沉默不宽恕地迅即飞翔,它在我们中间,在一团漆黑中爆发。除了舞蹈,一个人在这黑色的节日中还能做什么?那些聋哑人升起,被那些落下的炸弹推动着,那震动的地球到达他们的身体,他们开始舞蹈。

作品的女主人公罗斯,是寄予了作者政治理想的人物形象。西特·玛丽·罗斯是黎巴嫩一所聋哑学校的管理者和老师,出生和成长于黎巴嫩基督教家庭,由于同情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悲惨境遇,加入反政府组织,因而受到当权者的拘押、审判和处死。罗斯在受审时,所宣讲的关于黎巴嫩政治、宗教斗争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作者本人的政治和哲学理想:“我不认为巴勒斯坦人是我们的敌人,他们与这里的基督徒有同一个祖先,他们是我们的兄弟。”这场战争是两种权力之间的争斗,是世界的两种权力和两种概念之间的争斗。你们将它制造成宗教战争,来粉饰自我,掩盖问题。”作者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罗斯这黎巴嫩女性身上:幼年与穆尼尔一同受基督教学校教育的罗斯,清醒地认识到

自己不是西方人,而是生长于黎巴嫩的黎巴嫩人;她对弱势群体存有仁爱之心,同情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难民——她“爱这些被鼠鼠侵犯、像老鼠般四散奔逃的千千万万个男人和女人”;她爱那些无人关心的聋哑儿童,因为“在这个强权的社会,软弱者被视为魔鬼的造物,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

在罗斯看来,部落主义是阿拉伯地区内战的历史根源,无论是生活在这里的阿拉伯人还是基督徒,他们忘记了自己有共同的起源、历史和文化——代表了这片土地所拥有的古老的苏美尔文明的吉尔伽美什精神:“我代表爱、新的道路、未知和未尝试过的事物。一万年来,在这一世界之隅,我们总是部落的、部落的、部落的,忘记了吉尔伽美什,所有的纽带永远被打碎了。”吉尔伽美什精神代表了阿拉伯地区远古时代的多文化传统,它超越了某种特定宗教、文化的概念,代表了居住于阿拉伯地区的、拥有共同历史、传统、智慧的民族整体,这一“泛阿拉伯”的文化统一观,也常常清晰地表现在纪伯伦、雷哈尼等其他阿拉伯裔美国作家的作品中,也是阿拉伯裔美国作家所倡导的核心精神。例如,1999年出版的阿拉伯裔美国文学选集《纪伯伦之后:新阿拉伯裔美国文学选集》的编者,将吉尔伽美什精神看作所有阿拉伯裔美国文学的核心标准和共同原则。

《西特·玛丽·罗斯》除了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还蕴含着很强的女性主义观念。作品中一直以旁观者身份描述战争和罗斯命运的女作家,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叙述了玛丽·西特·罗斯的恋爱和生活,在全文的结尾,她以浓厚的女性主义立场,评述了玛丽的命运和悲剧——她就像一只鸟,无法冲破以男性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她只能被猎杀:

看他们!这四个男人决心要围攻这只路过的鸟……他们承认,她是一个有价值的猎物,真实的战利品,他们的捕捉堪称范例。她是一个女人,一个粗心的女人,叛逆进敌营,掺合进政治,而政治通常是他们狩猎的场地。他们……不得不把这个女人带回秩序,在这东方,既是游牧多变的,也是恒久不变的。即使对于那些巴勒斯坦人,他们同样会这样对待犯罪,程度不同,但方法相同。

艾特·阿德南(Etel Adnan, 1925-)是一位主要运用英语和法语进行创作的黎巴嫩裔诗人、画家、政论批评家和小说家,也是当代阿拉伯裔美国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描写黎巴嫩内战中的宗教、政治、生活和女性问题的小说《西特·玛丽·罗斯》(Sitt Marie Rose)是阿德南最为著名的作品,集中体现了她政治批评、女性主义和文学实验相结合的创作特点。这部小说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为作者带来了世界声誉,而与此同时,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对黎巴嫩战争、殖民教育、女性问题与弱势群体的犀利描述,使小说在黎巴嫩基督徒中成为禁忌作品,被称为“地下经典”。

用法语创作并出版于1977年的《西特·玛丽·罗斯》曾获得法国-阿拉伯友谊大奖,同年被翻译成阿拉伯语,次年又被译为荷兰语,荷兰语版本受到批评界和读者的关注,销量较大。1979年,该作被译为意大利语,从而促进了阿德南其他作品在意大利的翻译和出版。1982年,该作由乔治·克里格翻译成英语并出版,带来了持续性的影响,使阿德南在美国文学和思想界享有美誉。1988年,作品在德国出版并销量不菲,甚至被列入一所高中的阅读书目。此外,根据小说改编的

## 作家原声



## 思考「真」的奥秘

□(法)菲利普·福雷斯特 黄荏译

《薛定谔之猫》中有很多中国元素,不过跟真实的中国无涉,它近乎一种幻想——一个欧洲人仅通过文学对它产生的想象。虽然真实的中国,我到北京、上海或南京转一转就会给我一个惊艳的印象。《薛定谔之猫》中不时提到的中国——从第一页开始——是一个充满先贤智者和神话传说的神奇国度,我对它的描述很多都经不起推敲,我得承认有些故事的确是杜撰的。

不过,这些传说故事里头,至少有一个是法国读者耳熟能详的,那就是法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恶之花》的作者夏尔·波德莱尔在他的作品中提到过的那个。在一首散文诗《钟表》中,诗人讲述了一则轶事,是他从天主教的传教士古伯察神父写的有关中国的著作中读到的,那是神父的亲身经历。诗是这样写的:“中国人从猫的眼睛里看时间。一天,一位传教士在南京郊区散步,发现忘了戴表,就问身旁的小男孩什么时间了。小男孩先是犹豫了一下;接着就改变了主意,答道:‘我就告诉你。一会儿工夫,那男孩出来了,怀里抱着一只肥大的猫,像人们说的那样,死盯着猫的眼白看了看,毫不犹豫地说:‘还没到正午呢。’的确如此。”

当然,这个故事不一定确切,不过给人的感觉很好。只要像个孩子那样,看着猫的眼睛,就能从中看到映在它眸子里的时间,还有空间,乃至整个宇宙的倒影,波德莱尔曾说他对此深信不疑,它也成了《薛定谔之猫》的诞生。这就是为什么,它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或许应该先把它当做一首冗长的散文诗或哲学寓言故事去读。在法国,还有我的作品有幸被翻译的欧洲、亚洲和美洲的一些国家,我通常都被当做是自传体小说——也就是现在所谓的“自撰”的作者。的确,我所有的书,从《永恒的孩子》(它也是我第一本被译成中文的书)开始,都源自我的生活。但我的每一本书都在重写、重述我生命的故事,让我的生活变成一种新的梦境,为我打开不同的视野,让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思考我们每个人内心的奥秘、世界的奥秘,还有“真”之不可破解的奥秘。

可以把《薛定谔之猫》当作一本“量子小说”来读。我的意思是说,它的灵感来自量子物理。书名本身就是物理学诺贝尔奖得主埃尔温·薛定谔的一个假想实验,为了让人意识到物理学自身的悖论。从表面上看,现代物理学这一非常晦涩难懂的分支得出了一个荒诞的结论:一个事物同时是它自身及其反面,因此一只猫如果处在和和基本粒子一样的状态,那它就可以既生又死。这就要求把“实在”看作是无数平行宇宙的总和。

我很高兴一些真正的学者在我的小说中找到了对他们所思考、所研究的疑难问题近乎忠实的反映。不过我不是科学家,我是作家。量子力学的方程式和实验对我而言,就像是一个隐喻,表达了一个幽晦的梦境,那是我们每个人对现实和存在的迷思。人生在世是在所有可能性中穿梭的不确定的旅行。一个隐喻?是的,正如所有隐喻,这个隐喻同样有字面意义和引申意义。在成为科学实验的客体之前,我所说的猫也是一只真实存在,和我在一起生活过,教会我很多宝贵知识的猫,没有它,我会一直处在无知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读者可以把《薛定谔之猫》当作一个童话故事去读,这本书真正的主人公是一个像夏尔·佩罗的“穿靴子的猫”或刘易斯·卡罗尔的“柴郡猫”一样神奇的小动物;这个小生灵带你进入一个奇妙的世界,你要任由自己迷失在不可理解的奥秘之中,为了辟出一条通往“真”的路。

## 动态

# “非洲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本报讯 近日,中国首届“非洲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英国、尼日利亚、坦桑尼亚、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刚果(金)、加纳等国和国内高校及科研院所的近百名学者,就非洲文学、非洲语言文化等宏观命题以及阿契贝、斯瓦希里语等具体专题展开交流。

在大会主题发言中,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戏剧系系主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海外讲席教授 Femi Osofisan 肯定了会议对于中非文学文化交流的意义,回顾了北京大学亚非系非洲文学学科建设的历史,并对学科建设寄予殷切的希望。尼日利亚学者 Chima Anyadike 以“阿契贝和恩古吉的非洲本土语言之争”为题,指出无论是阿契贝运用英语写作还是恩古吉采用非洲本土语言写作,都是试图使非洲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版图。李永彩以“中国与非洲文学”为题介绍了中国非洲文学研究的历史。北京外国语大学孙晓萌从多学科的视角,运用文献学、历史学、社会语言学与政治学等方法,深度分析了豪萨语从阿贾米语书到拉丁文书写的深度原因,分析了语言运用与知识以及权力的关系。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程莹在发言中,梳理了自己在尼日利亚做田野调查、采访作家、调研演出实况的成果,借用流动性概念解读了当代尼日利亚戏剧对日常城市生活体验的挖掘。

此次国际会议的主旨也在纪念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北京大学副教授蒋晖认为阿契贝是“非洲的鲁迅”,阿契贝《神箭》的主题体现了日本学者竹内好提出的“回心与反抗”的概念,而这也

是鲁迅作品的特点——以弱小民族为主体创作的反抗的文学。华侨大学杜志卿分析了钦努阿·阿契贝的笔尖作品《曾经有一个国家》,指出尼日利亚战争既是以阿契贝为代表的当代尼日利亚知识分子的巨痛,也是他们在思考其国家和民族命运时无法回避的话题。高文惠从寻找自我属性、仪式的回归与补偿、直面非洲现实三个方面论述了阿契贝的本土表述。

讨论非洲文学专题时,国内非洲斯瓦希里语文学作品翻译家蔡临祥基于自己的翻译和研究工作,介绍了多位具有代表性的非洲本土作家。颜治强在论文中讨论了英语在非洲的功能、作用和变异。穆宏燕在《循环永生与直线毁灭——论索因卡死亡(与国王的侍从)中的时间观》一文中认为,剧中的对抗大半是形而上的生命轮回,体现了循环时间观和线性时间观的对立,但更体现了非洲的循环时间观——拯救循环时间观,这种非洲智慧是现代走出进行时间观的一个精神途径。肯尼亚肯尼亚塔大学菲利普·厄洛发表了题为《“杂交性”：象征主义与文本概念阐释与非洲后殖民英语小说》的论文,考察了相关文本中的象征、文本语境及其与“杂交性”的关联。陈梦在《索因卡对非洲传统的反思与超越》的发言中,认为索因卡的作品实现了西方和约鲁巴传统的二重组合和双向超越。闵雪飞分析了米亚·科托小说中文化身份的建构,2014年卡蒙斯文学奖获得者莫桑比克作家米亚·科托的代表作《不眠之地》被选为20世纪非洲大陆最重要的10部小说之一,他的创作力求寻求莫桑比克及非洲大陆的文化身份认同。李臻在发言中试图从库切的

《动物的生命》《耻》等文本中解读出库切生态书写独特性。吴舒琦通过文本细读分析了索因卡笔下的“狄奥尼索斯”——奥贡神的形象,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索因卡的创作观和世界观。

讨论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斯语部首席播音员陈莲英同与会者分享了几十年来做斯瓦希里语翻译的相关经历。北京大学阎焱润梳理了国内斯瓦希里语文学研究的现状,认为国内斯语文学目前还处于译介和评论阶段。

会议期间还举办了“非洲语言文学研究型人才培养模式研讨会”。与会者充分交流了对于国内非洲语言文学研究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看法,认为目前国内各高校的非洲语言文学领域的师资力量尚不能满足学生对非洲语言文学进行系统学习和研究的要求,需要各高校联合起来,共享现有资源,加强交流合作。

非洲文学,正在成为国际学界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之一。非洲文学真正蜚声国际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特别是80年代至今的20余年间,4位非洲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1986年尼日利亚的沃莱·索因卡、1988年埃及的纳吉布·马哈福兹、1991年南非的纳丁·戈迪默和2003年南非的库切。这从一个侧面表明,非洲文学已经不能再被看作边缘文学。20世纪中期以来,非洲文学的价值逐渐为世界所认同,国外已建立起颇为丰富和完善的学术机构和研究体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也已于2009年策划并启动了非洲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步伐。

(魏 巍 雅 菲)

## 书讯

### 《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中文简体版出版

日前,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最新作品《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书中,村上春树与音乐指挥家小泽征尔展开有关音乐和人生的深入对话。

2010年11月至2011年7月,村上春树在世界各地对小泽征尔进行了一连串访谈,都收录到该书中。“这一连串访谈的初衷,并不是要深入勾勒出小泽征尔先生的性格。它们不是新闻报道,也不是传记。身为一个乐迷,我企图尽量直率地敞开心扉,与小泽征尔这位音乐大师聊聊音乐,也试图诚实地刻画出我们两人对音乐献身的执著。”村上对撰写初衷如是说。

而作为受访者的征尔也特别感谢这难得的音乐与文学相遇的时光:“从前天天为音乐忙碌,从来没有时间好好回忆,此时让人怀念不已的回忆接踵而至。”

《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不仅原汁原味记录了两位大师关于音乐、关于文学、关于人生的理解和共鸣,也完成了村上春树内心感受的精彩诠释。正如村上春树本人所言“本书收录的并不是普通的访谈,也不是所谓的‘名人对话’。我在书中追求的,或者说在对谈的过程中认识到自己该追求的,是一种自然的心灵之声……但我往往从中听到了自己的心声。其中有些让我肯定‘这的确是我自己的感受’,有些却让我惊讶‘想不到自己心中竟有这种感受’。看来通过这些对话,我既发掘了小泽先生的心灵世界,也在某种共鸣中一点一滴发掘了自己的内心世界。”



黎巴嫩作家、画家艾特·阿德南油画作品

# 世界文坛

SHIJE WENTAN